晋祠圣母殿及鱼沼飞梁 晓扬 摄

【太原园林楹联赏析】2

晋祠博物馆的两副楹联

侯 莉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人共乐千秋节
乐不可无乐不可极乐事还同万众心
——同乐亭联(清·刘大鹏)

刘大鹏(1857—1942),字友凤,号卧虎山人,别号梦醒子,晚年又号遁世翁。山西太原县(现为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人,被乡里人称为急公好义,遗爱在民,一生为保护文物古迹做了大量工作。

同乐亭修建于清乾隆初年,取士庶同乐、百姓同乐之意。现为傅山纪念馆,虽名为亭,却是一座精巧雅致的小院落。

上联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出自《易经》的“乾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覩,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意即相同的音阶会产生共鸣,相同的气味会互相吸引,同类的事物会相互感应。同人共乐,指有着相同志趣爱好的人会心有灵犀、惺惺相惜。上联“千秋”与下联“万众”相对。“千秋”,本指千年的时间,后形容岁月长久。汉代李陵《与苏武》诗中有云“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宋代王安石《望夫石》亦有“还似九嶷山上女,千秋长望舜裳衣”之句。“千秋节”,本指皇帝的诞辰,始于唐玄宗。《唐会要·节日》中记载,“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等,上表请以是日为千秋节。”八月初五是唐玄宗的生辰,这个特别的日子被称为“千秋节”。唐代诗人杜牧《华清宫三十韵》中云:“歌吹千秋节,楼台八月凉。神仙高缥缈,环珮碎丁当。”生动地描写了皇帝生辰之日的热闹繁华场景。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策林》中说,“乐人之乐,人亦乐其乐”。上联的末句“同人共乐千秋节”,就是巧妙地化用上述典故。生命从这天开始,祈岁月静安,愿千秋万代,如此美好的日子,皇帝当然要与百姓共同庆祝,独乐不如共乐。上联写出了人生一大乐事,能遇到志同道合之人,能遇到具有美好德行之人,心有灵犀,求同存异,共同进步。上下同德,风云际遇,天降甘霖,与天下众人同乐,此为真乐。

上联重在讲“同”,末尾引出“乐”,由同至乐,承上启下,下联便着重讲“乐”。乐,不可无。人生在世,虽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但需常思一二。悲欢喜乐,人之常态,其中点滴的喜乐便是漫长人生道路上的抚慰和动力。同时,乐又不可极。此语出自《礼记·曲礼上》“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凡事有度,过犹不及,乐亦如此,乐极生悲。孔子曾言“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贞观政要·论刑法》中说“乐不可极,极乐成哀”。下联末句“乐事还同万众心”,引用宋代诗人蔡襄的七言律诗《上元应制》中“宸游不为三元夜,乐事还同万众心”。此处化用其意,主人巡游并不为观赏元宵美景,所乐的是能与万民同心。独乐,不如同乐;让快乐翻倍的秘诀就是分享。

上联首字“同”,下联首字“乐”,组合成为亭名“同乐”。足见撰写者希望与人同乐、心怀众生之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为真乐!

祖德宗功泽及寰海
高门望族仰止太原
——晋溪书院太原堂联之一

此联位于晋溪书院太原堂明间檐柱之下。

上联“祖德宗功,泽及寰海”,写出了王氏宗族祖先的功德光披四海,恩泽流布于海内外,影响深远。

下联“高门望族,仰止太原”,肯定了王氏家族的地位和影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那些高贵的、地位显赫的宗族望族,也仰慕太原王氏这一名门望族。

此联盛赞了王氏家族的地位。以祖先为荣的同时,更要以祖先为榜样,严于律己,不辜负祖辈的期望与寄托,在祖先奠定的深厚基础之上,继续把美好的德行发扬光大,才不会有辱王氏美名。此联也提醒世人,不忘过往,不负前人,才能行之高远。

晋溪书院太原堂联之一 王煜红 郭夏宏 摄

谈一谈 文学的力量

聂 尔

是文学为万事万物命名:从风雨雷电到草木虫鱼,从神到人,从鸿蒙至现代,没有文学,一切,所有,就都还停留在无名的黑暗之中。是文学发明了世界;至少,文学参与到了创造世界的工程中,并贡献出了她的力量。文学还可用于发现,因为,没有发现,何来命名?譬如,是文学发现了春天,桃花,大地的苏醒,荡漾,四月的外表及其内涵。于是我们才能置身于四月的此刻,并且我们的内心中没有了人和物不得其所的不安和焦虑之感。而要走进世界的深处,也就是我们一向所说的深入——深入生活,深入时代,深入宇宙之心,把自身灵魂的触角深入到他者的灵魂之中,也还需要文学。

此刻,我们就坐在时代的深处,置身于他者的灵魂的可理解性之中。同时,我们既在这个时代之中,也在所有时代的交叉小径的花园里面,这难道不是伟大文学的赐予吗?在发现,命名,深入之后,文学还展现出了她的表达的力量。没有表达,就没有存在。这是毋庸讳言的。表达乃是文学的专长。为了表达,文学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友情,亲情,爱情,这些人类的感情及其表达形式;勇气,正直,同情,这些人类的道德及其表现形式;神话,梦想,故事,这些人类独有的存在方式;星空,庙宇,道路,这些宇宙的交通方式……有哪一样在其漫长的建造过程中没有文学的参与而能够建立起来并发展成为现代的文明和现代的文化呢?

然后,就性质而言,文学之力是绵延的,传递的,渗透的,种植的。文学的绵延,如同时间的河流,不知其何所起,亦不知其何所终,因其绵延,可以载物,很多事物的留存都赖于文学之绵延;因其绵延,可以传递。伟大的传统正是通过文学的传递来到了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骨头和血的一部分,否则,我们中的任何人——无论他是谁,都永远只能是一个新生儿,永远不能成长为成熟的,文明的,具有道德心、同情心和社会性的人类中的一员。

文学之力还是具有渗透性的。文学的渗透性超过了水和风这些最初始和最本原的宇宙元素,因为文学是指向了精神和灵魂的,并且这是她唯一的指向。灵魂的城堡有时可以抵御风、火和水的侵入,但文学却寻路而进入到她的最隐秘之所,并在那里驻留下来,为阴冷枯燥的住室带来和煦的,轻柔的,敞亮的和意外的暖意。这是人类的创造超越了自然力的绝少有的证明之一。文学的种植力则指的是她和主体间的关系。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主体,从其诞生之日起,无时无刻不受到各种强力的摇撼,而能够轻易植入其心灵的,种子似的力量,叫作文学。是文学以其轻柔的笔触完成了人的定义。

连载

86

苏华 著

作家出版社

《大夏禹都》节选

阳城故名唐城,本在浍河流域。因为黄石林曾在翼城西天马村附近做过调查,天马遗址面积约为2500×1500米,发现有西周灰坑、陶器等,有些陶器尚属西周早期遗物。在其附近又有方城龙山遗址,可证唐城在翼城西的塔儿山下浍水之阳的天(天马村)曲(曲沃曲村)平原上,并认为旧典所说的“唐城”,即为山西翼城的阳城,较为实确。

关于禹都安邑,黄石林以《诗·魏风谱》所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也”予以解释。他说:《禹贡》在冀州目下,有“雷首之北,析城之西”,而安邑正在雷首(今中条山)之北,析城(今析城山)之西。冀州王畿,并包三晋,安邑是大禹之故虚。在列举了《帝王世纪》:“禹自安邑,都晋阳,至桀都安邑”;《水经·涑水注》于安邑注曰“禹都也”;《史记·吴太伯世家》《索隐》:“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阳(今平陆)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墟”;《括地志》:“安邑故城在绛州夏县东北十五里,本夏之都”;清顾亭林《日知录》云“夏之都,本在安邑”之后,他特别强调:“今夏县东下冯遗址发掘的城堡,正在文献中的夏之安邑地望范围之内。”为了说明夏代与龙山文化、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文化的关系,黄石林还根据夏县东下冯遗址发现的城基遗迹,经碳-14测定的绝对年代为距今3930±165年—3815±120年(树轮校正年代),即公元前20世纪—前19世纪,约当夏代中期,与河南二里头类型文化测定的年代大致相当。当然,他也没有推论二里头遗址和东下冯遗址谁前谁后,孰是孰非,而是本着科学研究的本分说:“两座城堡规模虽小,但它的历史意义却很大。这高峻的城墙,是划时代的标志,标志着阶级社会的产生,标志着社会进入文明时代。”

登封会议之后,继徐殿魁、王晓田、戴尊德的《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之后,张岱海、高彦在同年的《考古》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与试掘》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说:在山西队所调查的三十五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夏县东下冯是面积较大、文化内涵较为丰富的一处。东下冯遗址从1974年开始,连续数年,做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在遗址的东区和中区,发现了一批重要资料。东下冯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直接叠压在二里岗商文化层之下;同时,放射性碳素年代也与河南境内“二里头文化”遗存相当或接近;通过对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做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东下冯遗址与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河南境内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文化面貌大同小异。为了便于表述这种文化面貌上的大同小异,他们暂称它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东下冯遗址的发掘和“东下冯类型”的发现,使他们对晋南地区“二里头文化”的研究工作,在实践上和认识上都前进了一步。至为重要的是,通过对东下冯遗址陶器分期的初步研究,为晋南其他地点的夏文化遗存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尺度。为此,他们还就试掘永济东马铺头遗址发现的材料与东下冯遗存做了比较:永济东马铺头出土陶器,从器物群整体观察,与东下冯遗存十分近似;从陶质、陶色、纹饰和器形的特点看,则更近于东下冯遗址的早期和中期。虽然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有若干处是与龙山文化晚期或二里岗商文化共存的。

历史